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7卷第1期 1974年12月

《敦煌曲》評介

蘇 瑩 輝

本書布面精裝一厚冊（闊二十四公分、高三十三公分），封面法文書名為 *Airs de Touen-Houang*（《敦煌曲》），次行法文為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八至十世紀唱本）；再次為 *Introduction par Jao Tsong-yi*（饒宗頤撰〔中文〕序論）。

內葉在法文書名下，*Jao Tsong-yi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Singapore* 後，增列 *Adaptée en français avec la traduction de quelques Textes d'Airs* 及 *par Paul Demiéville*（由戴密微譯述，并附曲子選譯）兩行。戴氏為法蘭西學院榮譽教授（*Professeur honoraire au Collège de France*）及 *Membre de l'Institut*。末行為出版機構（國立科學研究院，*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及出版時（1971）地（15, quai Anatole-France, Paris VII^e）。定價每冊為二百一十五法郎。

內葉背面，又有法文註語 *Dans la même collection, l Pen Tsi King (Livre de Terme Originel)* 及 *Introduction par Wu Chi-yu (1960)* 三行，意謂在本叢書（巴黎所藏伯希和敦煌資料）內之第一種《本際經》的緒言，係吳其昱氏於一九六〇年所撰述。而此本《敦煌曲》則為該叢書之第二種，故本書封面上冠有 II 字。本書的封底印有中文的《敦煌曲》（集自敦煌寫經字）三大字。

本書分用中、法兩種語文撰述，包括「序論」、「曲子選譯」、「法國國立圖書館藏卷描述」、「中文法文詞語索引」四個部分。「序論」（中文）由現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主任饒宗頤教授撰寫；由法蘭西學院戴密微教授擇要譯成法文，并加註有關資料。曲子法文選譯出自戴氏手。另法京國立圖書館所藏卷子之詳細描述，則由 *Hélène Vetch* 小姐執筆。

全書（包含中、法文）共計三百七十頁，外敦煌曲圖版五十八頁；每頁影印的卷（冊）數量不等，但均標註原件的尺寸及入藏登錄之號碼。本文評介的對象，只限於此書的中文部分（頁一至一八二，亦即總頁碼：一八五至三六六）。

目錄及凡例簡介

本書首列《引論》，分上篇（敦煌曲之探究）、中篇（詞與佛曲之關係）、下篇（詞之異名及長短句之成立）三部分。下篇後為結語，附「詞與樂府關係之演變表」及「敦煌曲繫年」。「繫年」後始為《本編》。

《本編》計分：甲、新增曲子資料；乙、《雲謠集》雜曲子及其他英法所藏雜曲卷子；丙、新獲之佛曲及歌詞；丁、聯章佛曲集目。末附敦煌曲韻譜及詞韻資料舉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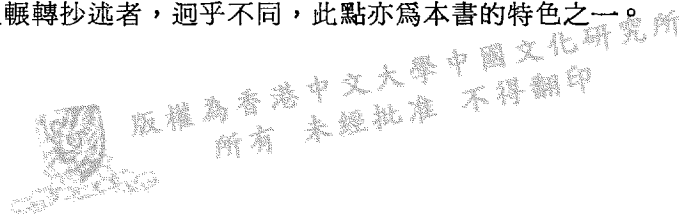
《本編》後附有索引兩種：一為《詞調卷號索引》，首列卷號，次列詞調名并各插錄其首句，再次為在本書的頁數及圖版頁數；一為《詞調字劃索引》，首列字劃，次列詞調名，再次為卷號。撰者於兩種索引後自加說明云：「一為卷號索引，二為詞調筆畫索引，均以本編所收錄者為限。前者以卷號為主，依照本編所見先後為序，兼標出每篇之首句；至所見圖版號數及本書葉數，一併注明，用備尋檢。其複見他卷者，詳第二『筆畫索引』，不復注出。後者以詞調為主，按其筆畫先後，注各詞調所見之原卷號數，俾可檢知某一詞調見于敦煌何卷，餘不復列。」

《索引》以後，頁一七八至一七九（總頁數為三六二至三六三）為全書圖版的法文目錄，但每目之下均附中文字詞調。頁一八〇至一八二（總三六四至三六六）為《敦煌曲》中文目錄。

《敦煌曲》圖版凡佔五十八葉（由 I-LVIII），由右向左看；每葉著錄曲子寫本（卷子或冊頁）二至三段（葉）不等。大小合計，共有圖版一一五枚。

本書所著錄的敦煌曲圖版，除了蘇俄所藏的一、二寫本（其中1465為《還京洛》，且係首次刊布，最為珍貴）外，雖皆法京藏卷，但饒氏序論（《引論》及《本編》）所徵引的曲子資料，則包括了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北京國立北平圖書館、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的藏品以及中、日兩國的私人藏卷。

筆者按：本書所引述之各卷，均係饒氏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間應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邀請訪法時，就巴黎藏卷逐件描錄，然後付印者。故此等資料，實可謂為第一手材料，與前此各家著述之輾轉抄述者，迥乎不同，此點亦為本書的特色之一。



各篇內容摘述

本書《引論》的弁言說，除對敦煌曲在中國文學史上之重要貢獻加以闡揚外，并就民間曲子作品的流佈情形、與其如何保存於寺院中的實際狀況，以及詞之起源與佛曲的關聯問題，在敦煌曲中獲致答案的跡象，作進一步之研究。《引論》為欲揭示敦煌曲與詞之起源，所佔的篇幅相當多，留待以後再介紹。現在先就《本編》部分摘要評述如次：

《本編》分甲「新增曲子資料」、乙「《雲謠集雜曲子》及其他英法所藏雜曲卷子」、丙「新獲之佛曲及歌詞」、丁「聯章佛曲集目」四大部分，不但為本書的中心節目，也是撰者的精心結撰之作。為了節省篇幅計，在介紹《本編》內容時，不得不力求簡約。

甲章所列舉之 P.2748, S.4359, L.1465, L.1369, S.1497, P.3718, S.4508 七個敦煌寫卷，除了糾正劉銘恕所編《斯坦因目》(S.4359《開于闐》)的缺失之外，并揭櫫下列各節：

- ① P.2748 《怨春閨》，為敦煌曲子中偶見的抒情之作。其疊字技巧尤勝，已開散曲之先河。
- ② L.1369 《長安詞》，此詞已刊于列寧格勒出版之影印《敦煌讀文》，為七言四句體。代宗時有謝良輔等作《憶長安》長短句，此《長安詞》則為齊言。
- ③ S.1497 《曲子喜秋天》，此當為《五更轉》之一格，而調寄《喜秋天》者。敦煌所出《五更轉》句式不一，多為佛讚，未見標明所寄之詞調名，若《五臺山曲子》之記明「寄在《蘇幕遮》」之例也；唯此題曰《喜秋天》，亦屬罕見。
- ④ 在唐末詞型未固定以前，同一詞調，用韻及句式極為自由，非如後人之言詞律為嚴格之分體。

乙章除首列《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以 P.2838, S.1441 兩卷綴合），并詳加斟證外，另列舉 P.3994, 3836, 3137, 3333, 3128, 3821, 3271, 3093, 3360, 2809, 4692, 3911, 3251, S.2607, P.2702, S.1589, 4578, P.4017, 2506, S.5540, 4332, P.3319 V^o, S.5643, 5852 二十四個有雜曲的卷子，將每首曲詞一一照錄；并分別予以校勘比證，使讀者可以觸類而旁通，這確實是石室寫本發現以後關於敦煌曲的一部空前鉅製。

本章尤為《本編》的中心節目，具見撰者文學修養之淵深，其細緻的描寫與精闢的見解，時流露於字裏行間。姑舉數事如次：

P. 3128之《望江南》，第五句「目斷望墀」望下脫「龍」字，饒氏因 P. 2809 作「目斷龍墀」（脫「望」字），遂據 P. 3911 卷校定為「目斷望龍墀」。此類例子，幾乎每首皆有，不勝枚舉。

《五臺曲子》，敦煌卷所見不一。例如 S. 2080 與 S. 4012 二殘卷，皆白棉紙，正楷書，饒氏以其字體相同，知原為一紙斷作二片，嗣在倫敦會將之綴合。最可貴者為紙尾題：「天成四年……孫（冰？）書」一行，可定其年代。此外，經饒氏綴合的曲子寫卷尚有數種，不復縷舉。

撰者不僅邃於丁部之學，且精八法，凡遇字體特優的寫本，往往加以讚揚，例如：P. 3994 為蝴蝶裝冊子，散葉共三紙，兩面書。饒氏云：「字作歐體，剛健可愛；敦煌曲子詞卷書法，以此為最佳。」又於 P. 3360 《大唐五臺曲子》五首「寄在《蘇莫遮》」下云：「此卷為行書，字體近李北海一路。」筆者按：此雖藝事，亦可說明唐自太宗以來，朝野之重視書學，實非偶然。

S. 2607 之《浣溪沙》（四首），饒氏於第一首下註云：「原題失調，作《浣溪沙》，誤。」又第二首末句「在五湖中」下註云：「五湖句，原卷『在』字側注一『五』字，各家皆忽畧。」又第四首第二句「船車擦亂滿江津」下註云：「『車』字甚明，各家均作『船中』，非是。」凡此可見撰者之治學態度，認真不苟，且富抉擇與判斷的能力。

敦煌一般中文卷軸之字體，優劣不等，其書法工整（無別字、俗寫）韶秀者固多，而潦草拙劣者亦復不少。曲子鈔本，自不例外，為之校讎寫定，實非易事。今本編所錄各曲，每首皆經撰者援引眾本，舍短取長，加以校正。姑錄 S. 2607 之《西江月》一首，示例於下：

雲散金波初吐，煙迷沙羨（渚）沉沉（沈沈）。棹歌驚起亂西（栖）禽，女伴各歸南浦（浦）〔注：原卷誤作「浦」〕。船押（狎）波光遙野，虜（據）〔注：「野虜」二字相接，但無／號，王《集》作「野歡」，不當。〕歡不覺更深。楚詞哀怨出江心。整量（正值）明月當南午〔注：「午」字細看不是「干」字〕。

其中「整」、「量」二字，如對敦煌卷子未嘗涉獵者，即無從確定為「正」、「值」

二字。凡此足徵撰者對於敦煌曲子研習之勤。

S. 5643 (《曲子送征衣》) 及 S. 5852 (《生查子》) 兩殘葉，前一葉王重民《敦煌詞集》只錄《送征衣》一首，尚有三首失調，撰者特將此葉存字全部摹出，并試爲句讀，頗愜人意。後一葉紙已污黑，存六行，與 P. 3994 《魚美人》筆跡類似，撰者疑此首詞調爲《生查子》，王氏新本《曲子集》錄入，未加句讀。饒氏以其用入聲韻極分明，又爲之句讀，亦頗恰當。

本章於 P. 3128 《望江南》各首引任二北說，及 P. 3360 卷下關涉沙州張、曹二氏處，容有可商，畧述於下：

P. 3128 之《望江南》第一首(起二句爲「曹公德，爲國託西關！」)，王重民、任二北二氏皆謂係六戎來歸之百姓歌頌曹議金功德者，其說大致可信。按：議金在莫高、榆林二窟供養題名的結銜，均有「托(不從言)西大王」之稱，《五代史》亦謂其唐莊宗時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託西大王。故「西關」之「關」既似失韻(任氏說)，自以從饒氏所引 S. 5556 卷作「拓邊西」爲是。第二首(有「敦煌郡，四面六蕃圍……目斷望龍墀。新恩降，草木總光輝」句)之「六蕃」與第一首之「六戎」，蓋猶第三首之「諸蕃」，「六」字在此爲多數的泛稱，并非確數。此首任氏初以爲曹元忠於開運元年(944)獻忠「大朝」之作，繼又謂作於曹議金(後晉開運)時代；實皆無稽之談。竊考開運時，議金已前卒(約在936年)。若云此首爲議金獻忠大朝之作，亦當在後梁貞明中，而不得遲至晉出帝時。我以爲「新恩降」之「新」字，或指朱梁新篡立而言。容俟續考。第三首有「大朝宣差中外使，今因絕塞暫經過」句，任氏據高居誨使于闐事，假定其作辭時代在後晉天福三年(938)，并疑前後兩片或有錯簡。我覺得前後兩片的内容可以銜接，未必有錯簡。至於作辭時代，似乎不應更在開運(944)以後。容當專文論之。第四首有「邊塞苦！……背蕃歸漢經數歲……太傅化，永保更延齡！」(見 P. 3128 卷)等句，王有三氏以爲作於歸義軍張氏統治時代，任氏則謂「此辭之『太傅化』，十九指曹元忠而言」。饒氏註云：「太傅化之『傅』，S. 5556 作『保』。」筆者按：瓜沙曹氏自議金以後，元深、元忠、延恭均有「檢校太傅」之稱，其授「檢校太保」者，只延祿、宗壽二人。如依 S 卷(假定此首與前三首不相連接)作「太保」，再就「背蕃歸漢經數歲」句觀之，此太保當指張義潮，而非曹氏子孫。如依 P. 3128 卷(假定此首與前三首連接)作「太傅」，則此太傅應爲議金，而非元忠。議金的「太傅」結銜，雖

在二窟題名中尚未發現，但其「司空」、「太師」、「太尉」、「中書令」等銜名不僅習見兩窟題記，且亦載於正史。然則議金在加授檢校太尉之前曾授檢校太傅，似亦未嘗不可能。

P. 3128, 3821 兩卷，各鈔《感皇恩》二首，但內容則一，任二北氏認為可能是大曲之辭，并謂可能出於玄宗朝。筆者就曲辭觀之，疑是宣宗時作品，容俟續考。

P. 3360 卷背面寫曲子詞，正面又雜寫「十四十五上戰場」等句二行，及「歸義軍節度使」與《大唐五臺曲子五首》(題目)。饒氏謂可推知張議潮時代所鈔錄，不知有無其他依據？若無他證，竊以為唐代在議潮以後任歸義軍節度使者，尚有張淮深、索勳、張承奉三人，五代時有曹義金、曹元德、元深、元忠四人，宋初有曹延恭、延祿、宗壽、賢順四人，共計十二人。在未得到確證以前，似不宜貿定為議潮時寫本。

本章末附載羅振玉和日人藏本之曲子及《雲謠集》板本資料(十二種)，并摘述其內容，頗便研習曲子詞者之參考。筆者按：第十種唐圭璋之《雲謠集雜曲子校釋》一文下，漏列「國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一行，補述於此。

丙章錄新獲之佛曲及歌詞(有《行路難》、《五更轉》、《黃昏無常偈》、《禪門十二時》、《歎百歲詩》、《押座文》、《十二月歌(詩)》、《詠九九詩》、《寄窠(鼓)子》、《記從地涌出銘》等篇)，凡十五個卷子。其值得注視之曲詞內容如下：

S. 4781 《黃昏無常偈》，此五時無常偈，七言、五言互用，當是別偈之類。又此偈不增和聲，而以七言、五言雜用，仍是唐人歌詩之法。最堪注意者，為《黃昏偈》之七言八句，其用韻及句法，與《蝶戀花》合。《蝶戀花》為唐教坊曲，調見南唐李煜詞，敦煌曲子未見，此則尤堪注意者。饒氏於此偈下并附論《五更轉》之別格及偈之體裁，均極詳盡。

S. 1588, P. 3361 《歎百歲詩》，S 卷的字體近草，風格與《押座文》相近。中間一段，越寫越佳，字近後來倪雲林一路。饒氏并揭示百歲詩之作法有三特點云。

S. 6208 背書《十二月歌》(擬題)，應為南朝樂府《西曲十二月折楊柳歌》之遺響。詞中「二月」、「四月」兩作「也く也く」，自是和聲，如古樂府「賀賀賀，何何何」之類。道家《步虛詞》之「何下くく」亦有同然。

S. 6171《寄京子》(饒氏疑「京」為鼓字)卷前段缺,文體似宮詞,共四十九行。撰者因詞中有「銀臺門外多車馬」句,考知為五代後梁時作品。并據薛史《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司天臺奏今(八)月廿七日平明前,東南……老人星見」一事,認為即是詞中「坐上司天封狀入,南方初見老人星」句所詠者;而「降誕宮中呼萬歲」句所指,即謂梁帝生辰。凡此具見撰者運用文史互證的識力獨到處。

S. 6228,此卷首題全文為「籀關鎮去乾六年十二月廿九日進上銘記,其記從地涌出」。中有「三六王,十八子……佛法成,換天地……」云云,撰者考知「唐懿宗迎佛骨」、「僖宗時地震、水災頻仍……」等史實與銘文內容相符。并謂此銘蓋預言之類,因係韻語,且作長短句,雖非倚聲之體,以有裨于考史,故併存之。

丁章所收聯章佛曲集目,相當完備。惟持與日人金岡照光氏所編最近由東洋文庫出版之《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相校,尚不免一二遺漏處。至本章所錄而為金岡氏《目》所未列者,竟達十餘卷之多。茲畧述數事如次:

本章所集聯章曲目,約分《百歲篇》、《十二時》、《行路難》、《五更轉》、《悉談章(頌)》、《散花樂》、《觀音偈》等類。金岡氏《目》的分類,與此間有出入,例如:S. 619卷之《讀史編年詩》,金岡《目》則入「雜詩賦(文)類」。S. 6631卷背原題作「維摩五更轉十二時」,而金《目》定格聯章類「十二時」之屬收S. 2454(1)「維摩問疾十二時」殘卷(存八行)一,另以S. 2454(2)「維摩五更轉」入於同類「五更轉」之屬。又本章未錄S. 6208《十二月相思》(擬題)十六行,但於丙章「新獲之佛曲及歌詞」內列有P. 3812《十二月詩》數首(有「乾寧二年」一行),并謂可與S. 6208卷比勘。又《散花樂》諸首,金《目》則入「讚文佛曲類」的「和聲聯章」之屬。

本章著錄之P. 2483, 3083, 3065, 2963, 2270, 2976, S. 6077, 5529, 6631, 1497, L. 1363各卷,均為金《目》「定格聯章」類所無。

金《目》「定格聯章」類之S. 6103(1)「失題十二時曲」殘卷,任氏《敦煌曲校錄》及本章似均失載。又金《目》於S. 5549「《百歲篇》三篇」下,分為:a.《縉門百歲篇》(存十七行);b.《丈夫百歲篇》(廿四行);c.《女人百歲篇》(廿九行)。本章於S. 5549下云:「乃《丈夫百歲篇》、《女人百歲篇》之合抄本。」撰者似只以b、c兩篇為合抄本,漏列a(《縉門百歲篇》)一篇。

本章集錄敦煌以外之《五更轉》調曲及北京、英、法、蘇各地所藏敦煌《五更

轉》的寫卷，頗為詳盡。最後并附列《五更轉》句式，示學者以津梁。

金岡氏《目》於「定格聯章」類所收《五更轉》佛曲并不多，然較本章多 S. 4654 (10) 及 P. 3386 (2) 兩殘卷，S 卷所鈔，係在 S. 4654 (5)《舜子變》一卷後書寫。P 卷所鈔，則在 P. 3386 (1)《季布罵陣詞文》後接寫。豈饒氏不以「楊滿山詠《孝經》」(即 P. 3386 之 2)一曲屬之聯章歟？又按：北京之周字七十號，許國霖擬題為《五更調》(劉復《敦煌掇瑣》三八題作「南宗讚」)，與 P. 2963 文字相同，亦為「五更轉」的調子。任二北《敦煌曲校錄》則兼取巴黎北京兩卷所長，而以異文互校，題曰《南宗讚》。本章僅列 P 卷而未錄北京藏號，故附記之。

本書的《本編》之後，殿以「敦煌曲韻譜」，舉出用韻梗概，以供治斯學者進一步之探討。該譜首立「畧例」(凡七條)，次按四聲(平、上、去、入)所屬各韻部，於每部首分標韻目(如「東」、「江」、「支」)為題，在各題目之下，先列韻字(如「東」、「鍾〔冬〕」韻目下的「逢」、「通」、「胸」等字)，次列曲詞調名(如《菩薩蠻》、《酒泉子》等)及卷子字號(如 S. 2607, P. 2809 之類)。讀者按韻覓曲，一索即得，尤為本書特色之一。

《本編》內容，約如上述。茲續介紹《引論》的各篇節目名稱，并間述管見於次。

上篇「敦煌曲之探究」計分敦煌曲之訂補、敦煌詞之年代問題及敦煌曲之作者三章。各章內容如下：

(一)敦煌曲之訂補

- 甲、補詞——舉出王重民、任二北二家所缺載者，凡九種(計 P 三種，S 四種，L 二種)。
- 乙、補句——計補《北京》卷一，S 卷三。
- 丙、綴合——S 卷(S. 2080+4012)及 P 卷(以原在藏文47號之冊頁與 P. 3836 卷綴合)各一種。
- 丁、補作者名——P. 2054《十二時》各書失載作者之名，據卷背標題，知為智嚴所作。

(二)敦煌詞之年代問題

- 甲、S. 4332 卷「廿廿霧」之年代

「廿廿霧」(即《菩薩蠻》)詞牌，開元時已有之。任二北曾舉 S. 4332 卷以

證其出于天寶，且指此為最古之《菩薩蠻》，實未必然，蓋此卷之《菩薩蠻》《酒泉子》《別仙子》三詞，當抄于貞元壬午（18年）之前後，決非天寶之頃也。

乙、P. 3128 所錄詞「類見老人星」之年代

此卷共錄詞十五首，其《菩薩蠻》中二首，有乾寧（896）及開平（907）年間事，可為年代之定點。

丙、P. 3360 《大唐五臺曲子》之年代

北京鹹字18號讀文：「大周東北有五臺山」，任二北以「大周」為武周。然據 P. 4625 及列寧格勒藏卷均作「大州東北有五臺山」，是周乃州之同音別寫，并非武周之周。又所謂《大唐五臺曲子》者，「大唐」應指後唐。

(三)敦煌曲之作者

甲、「御製」問題

敦煌曲有題「御製」者，不知何帝所撰？就諸家五代史傳有關記載觀之，當日多日後唐莊宗之作品為「御製」。

乙、可確知之作者

敦煌曲子之作者，今可確知者為溫庭筠、唐昭宗、歐陽炯、沈宇四人，所作曲子有《更漏子》「金鴨香」（溫氏），《菩薩蠻》「登樓遙望……」「飄飄……三峯」二首（昭宗），《更漏子》三十六宮及《菩薩蠻》「紅鑪暖閣」（歐陽），《樂世詞》「菊黃蘆白」（沈氏）諸首。

其僧人之作可確知者，有悟真、智嚴二人。悟真曾作《百歲詩》及《五更轉》、《十二時》（共十七首）。智嚴之名，見于 S. 5981, 2659, P. 3556 諸卷及 P. 2054 《十二時》長卷之背（淡墨題端云：「智嚴大師《十二時》一卷」，此行大字為饒氏首先發現者。）撰者以為 S. 5981 與 S. 2659 卷中之智嚴，當是 P. 2054 卷之智嚴大師；亦即《十二時》之作者也。此一智嚴，撰者認係後唐同光時人，與前此之兩智嚴（一在宋元嘉時，一在唐景龍時，隸于閩國籍）并非一人。

中篇「詞與佛曲之關係」，計分七章：一、詞之起源與佛曲（讚詠）兼論敦煌所出之佛讚集；二、詞與法樂（法曲）梵唱及僧人之改作舊曲；三、偈讚與長短句；四、讚詠在道釋文學上之發展及其與曲子之分途；五、和聲之形態及其在詞上之運用兼論佛曲

之樂府；六、敦煌曲與樂舞及龜茲樂；七、敦煌曲與寺院僧徒。

茲就下列各節，畧抒管見於次：

第二章論「作聲」云：「轉讀可以返折旋弄，是謂作聲。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能詠維摩一契，必待沙門爲之作聲；用轉折之唱法出之，卽成梵唄。齊文皇帝所製之法樂，既有梵舞，必合以唄響，其爲佛曲，可無疑義。」筆者按：陳寅恪氏早年撰《四聲三問》一文，認爲中國語言雖有四聲，但四聲之中還有變調，四聲之分不易被發現；而能以發現四聲的，還是靠梵文的啓示。我那時對此說法疑信參半。今讀饒氏引論，證以陳氏「中國文字的特質，是孤立和單音。因其孤立，宜於講對偶；因其單音，宜於講音律。宋齊以來，佛經轉讀之風日盛。……慧皎說：『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者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這正說明單音的漢語，不容易傳達梵音的美妙」云云，益見「四聲的發現，有賴梵文啓示」之說爲不誣。

第四章論敦煌曲的分類云：「任二北《敦煌曲校錄》分普通雜曲、定格聯章、大曲三類。撰者以爲定格聯章幾全爲佛曲，此類佛曲，不能概目爲詞，任說似嫌泛濫。」筆者按：饒說甚是。日人金岡照光所編之《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解說》（東洋文庫1971年版），其「曲子詞」類，僅收普通曲子與大曲，而以「定格聯章」別爲一類；復於「讚文佛曲」類收讚文與和聲聯章兩體，似較任《錄》更爲完善。同章論「詠讚」在宗教上之運用及佛教與道教同樣發達云云。筆者按：此處所稱之「宗教」，實際上僅指佛、道二教言。竊意景教自會昌滅法後雖漸式微，但其潛匿於道教之內者，則其影響終不可滅，如呂祖一派之道教，其所傳《救劫證道經咒》之雜有景教讚美詩歌，卽其例證。至於景教經典，遺存敦煌石室者雖不多（約六七卷），然據景教《尊經》後記所云：「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卅部卷。」爲數亦復不少。何況中國等地所發現的敘利亞文景教經頌，尚不在此限。若言「詠讚」一體，敦煌所發現的景教讚歌，亦有《景教三威蒙度讚》、《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兩種。又按：本書頁二〇八第十九行「道書之分類，特闢讚誦一門」及頁二〇九之「《本際經聖行品》第三：『……十一者讚誦，十二者章表。……讚頌者，眾真大聖……』……可知讚誦一科，唐初已獨立爲道書十二事之一。《雲笈七籤》引《道門大論》，言道書分十二部，第十一爲讚頌。」有作「讚誦」，有作「讚頌」，不知究以何者爲正？

第六章論敦煌所出之樂譜實即《龜茲譜》，由於敦煌卷中的曲調間與龜茲樂曲相同，兼之唐末五代以來藝人文士們的繪畫與文學作品，每以龜茲樂舞為描繪的對象，故知五代時龜茲樂仍盛行云云。筆者按：開元天寶為唐代音樂最盛的時期，在此時期盛行的則為法曲。北朝齊周和隋代，是龜茲樂與其它外族樂的最盛時期，到了李唐初葉，龜茲樂雖還盛行着，然而局勢已在轉變，這是因為法曲興於隋，至唐而大盛的緣故。由於盛唐是法曲全盛時期，所以從龜茲樂和其它外族樂來說，唐代已是一個由盛而衰的低潮時期。不過，話得說回來，唐代盛行的法曲中，也雜糅着清商和胡樂（包括龜茲樂）的晶體。所以由清商和胡樂結合而成的法曲既興，於是純粹的清樂與純粹的龜茲樂遂逐漸地消沈萎縮了（略參丘瓊蓀說）。以上是就整個的唐代樂壇立論，若就晚唐五代時期的敦煌地區言，由於它自古便是東西交通的要道，《耆舊記》稱為「華戎所支一都會也」。裴矩的《西域圖志》亦云：「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故佛教東來，首先受到影響的，是敦煌。西域入唐的樂曲，也以敦煌為第一個轉播站。吾人明瞭了這些因素，對於五代時龜茲樂仍在敦煌流行的盛況，就不以為奇了。

第七章撰者於 P. 3836+3137 原為蝴蝶裝下稱：「現經綴合後，知起于『又同前夜夜長相憶』，訖于《獎美人》『像白蓮出水』。」又註云：「見左景權：Remise en Ordre du Ms P. 3836 一文。」查左文於證明 P. 3836 係自 P. 3137 小冊子脫出後，并謂據原冊之裝訂形式看，可斷言其與 P. 3836 號之間尚有脫簡云。因恐未覩左文者有所誤會，故附記之。

下篇「詞之異名及長短句之成立」計分三章，第一章「詞之異稱」下，有「雜曲及曲子」、「雜言」、「倚聲、填詞」、「小詞、小歌詞」、「語業、長短句」五目。第二章為「敦煌卷中『詞』字之異義」。第三章為「詞在早期目錄書中之地位兼論其功用與歌訣」。

「結語」的要點，歸納為：（1）「詞」字在敦煌卷所見，有曲子、俗講之曲詞、詞文、變詞、章曲等涵義。從廣義言，「詞」一名幾成為講唱文學之統稱。而長短句之體式，又為樂府、佛讚、變文所共有，甚至偈讚之短偈長行合體者，亦得名曰長短句。（2）敦煌卷子（資料提供）對於「了解曲子詞產生之背景」，有極大裨益。（3）佛曲之發展，與樂府關係甚深：a. 以佛讚套入樂府舊曲。b. 原為梵曲，後演為樂府雜曲歌辭之詞調。c. 樂府民歌之和聲，與梵唱配合。d. 僧人改作舊曲以入法樂。此種現象，六朝以來極為普遍，可見民間歌曲與宗教文學之漸趨合一。（4）敦煌所保存有關詞之材

料，宗教詞、樂工詞與文人詞三者均有之，而以宗教詞之佛曲為最多。(5)讚詠在宗教文學上之分類，唐初已占一獨立地位，道教《本際經》可為證明。敦煌所出佛讚多為專集，此類作品，與詞本分道揚鑣，不當糅合也。(6)附：「詞與樂府關係之演變表」。

「敦煌曲繫年」——首列公元、年號(干支)、月日，次列曲子(包括讚文、變文、定格聯章等)名稱、撰人或書手名氏及其他(如寺名、官銜、紀事等)，最後標註卷子字號。自唐天寶年間起，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止，凡錄三十五卷，頗便讀者省覽。惟其中徵引卷號、曲子分類及瓜、沙史事部分，不無小小差異，筆者謹就所知摘述一二於次：

九四二年(天福七年壬寅)書揚滿山詠《孝經》十八章，標註卷號為 P. 3582。

按：日本學者金岡照光氏所編《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及解說》於「定格聯章」類錄 P. 3386 揚滿川詠《孝經》壹拾捌章，并云「一名滿山」，存四十行；識語為「維大唐天福七年壬寅歲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學郎張富盈記」。又於「普通曲子」類錄 P. 2633 揚蒲山詠《孝經》壹拾捌章，并云首完尾缺，存十九行；無識語，但同卷有「壬午年正月」字樣，故疑為九二二年(後梁龍德二年)或九二一年寫本。饒氏《繫年》著錄之詠《孝經》一卷，諒即金岡氏《類目》之 P. 3386 一卷，惟卷號則異。

八七九年(乾符六年十二月)簫關從地湧出銘詞，翌年法琳書之，標註卷號為 S. 6628。

按：此卷首題全文為「簫關鎮去乾六年十二月廿九日進上銘記其記從地湧出詞」。竊疑「去乾六年」或係「去(年)乾(符)六年」之簡省，證以「翌年法琳書之」識語，則其書寫時代應在八八〇年(廣明元年)了。

八六五年(咸通六年二月)僧福威牒，背題「歸西方讚一部」，即法照撰「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標註卷號為 P. 2066。

按：P. 2066 卷背之「歸西方讚」僅存四行九句，金岡氏《類目》入於「讚文」類。

九二一年(貞明七年、龍德一年辛巳)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目連變》并圖。標註卷號為 S. 2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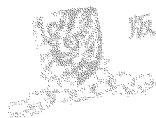
按：此卷首題「大目乾連冥間教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尾題「《大目犍連變》一卷」。凡四百二十一行，為七言韻文與散文混合體，一般著錄均認係典型的長篇變文形式，金岡《類目》則入於講唱體「變文類」之 B「佛家故事」類。此卷識語有

「貞明七年四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張保達文書」一行，貞明爲朱梁末帝年號，但止六年，翌年即改元龍德，故饒氏「繫年」於「貞明七年」後著「龍德一年辛巳」六字。

八五一年（大中五年辛未十一月）張議潮收復河西授節度使，都僧統悟真作《五更轉》及《十二時》以頌德政；共一十七首，惟序尚存，詩已佚。標註卷號爲P. 3554。

按：此卷并無撰作和書寫年代之識語，惟首題有「謹上河西道節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轉》……」字樣。饒氏蓋因悟真爲沙州光復後奉使入朝的沙門之一，故繫其詩於大中五年議潮授節度使之月。然細覈之，悟真此時（851年）的結銜僅爲「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兼攝京城臨壇供奉大德，賜紫」，尚未陞任都僧統。而「收復河西授節度使」云云，亦只可解釋爲議潮於是年十一月受命爲河西道歸義軍節度使，而非爲河西節度使。蓋其時涼州尚未歸唐耳。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于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Review on *Airs de Touen-Houang*

(A Summary)

SU YING-HUI

Airs de Touen-Houang which contains four parts with 58 plates, is corporated by Prof. Jao Tsung-i and Prof. Paul Demiéville. The first part is an introduction by Jao in Chinese. The second in an adaptation of Jao's introduction into French together with a translation of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the edited poems by Paul Demiéville. The third i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anuscripts by Miss Hélène Vetch. The fourth is the Terms Index both in Chinese and French.

Prof. Jao was invited to Paris from 1965 to 1966 by the C.N.R.S. to investigate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that P. Pelliot had brought to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1908. The *Airs de Touen-houang* includes Jao's critical edition and study of the Tun-huang lyrics kept in Paris, collated with manuscripts kept in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Jao's examination on these documents derives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give an outline of Jao's work and to discuss a few points on the date of the manuscripts 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fact of Tun-huang during the middle T'ang dynasty.